

从网络新词“怼”看方源词的扩大化^{*}

钱添艳, 尹 群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 南京 210008)

摘 要:从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中寻找网络新词“怼”的来源,几乎找不到与之具有紧密联系的词。但在方言中,方言词“擗”的意义和语音形式与“怼”十分相似,且具有广泛的使用基础,因此可以推测网络新词“怼”来源于方言词“擗”,并且由于“怼”有加入共同语的趋势,可以将其视作方源词。而与一般的方源词相比,“怼”的词义发生了较大变化,其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更加丰富,色彩意义也有所变化。这些变化反映了以网络为媒介的方源词通过发展词义实现了扩大化。

关键词:怼;擗;方源词

中图分类号:H10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734(2019)11-0110-07

随着社会的发展,新事物层出不穷,共同语中已有的词汇已不能满足人们的表达需要,对此除了词本身的发展变化以外,方言中一些富有表现力的词也在不断充实着共同语。而在新媒体时代,方言进入共同语的途径更加多样化,网络也是其中不容忽视的影响因素。一方面,方言词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网络语言的发展,驱动了很多新词的产生;另一方面,来自方言的新词在网络语言的影响下实现了词义扩大化,不断丰富着现代汉语词汇系统。本文以“怼”为例,探讨了“怼”从一个方言词变成方源词的过程,以及这种现象又是如何体现方源词扩大的。

一、网络新词“怼”与共同语“怼”的比较

网络新词“怼”既出现在人们的言语交际中,也出现在网络媒体的报道里,前者零碎而难以记录,后者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可以通过观察网络媒体的报道中“怼”的使用情况,对其意义进行归纳。于此,田菊^[1]和张薇薇^[2]做了较为细致的分析,可以看出“怼”在网络中往往作动词使用,综合两人看法,可以将“怼”意义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种:

其一,表示一物与另一物产生碰撞:

例1:夜间怼歪津昆桥栏杆 汽车面目全非司机不知所踪(今晚报 2017年12月12日)

例2:重炮怼坦克! 德自行火炮练平射反装甲(网易新闻 2018年3月2日)

例3:遂宁一小车超车时“怼”上拉砖货车(四川新闻网 2018年10月8日)

其二,表示态度上的对立和语言上的针锋相对:

例4:盖茨直接怼特朗普税改(搜狐新闻 2018年2月20日)

例5:美国国务卿诋毁中国 被非盟主席当场回怼(观察者网 2018年03月09日)

例6:微信支付宝互怼:究竟谁的隐私保护更严格(环球网 2018年7月10日)

其三,表示调侃和斗嘴:

例7:江疏影娜扎花式互怼 《花少3》收获亲密友情(2017年4月26日)

* 收稿日期:2018-05-29

作者简介:钱添艳,硕士研究生,从事现代汉语词汇学及语法学研究。

例 8:《跨界歌王》张一山毒舌怼周冬雨:你进不了决赛(环球网 2017 年 6 月 9 日)

例 9:欢乐!刘国梁笑怼丁宁球技最差(新浪体育 2018 年 2 月 18 日)

从上述三个义项看,不管是动作上的对立——碰撞,还是精神上的对立——表示态度上的不满,甚至是亲昵式的对立——表示斗嘴,网络新词“怼”表示的都是一种对立关系。并且在这些句子中,“怼”均能独立运用,也能与别的词自由组合。

在古代汉语中,“怼”也是一个词,但词义与网络新词“怼”有所不同。《说文解字》中对“怼”的解释是:“怼,怨也,从心,对声。”可以解释为“怨恨”,体现情绪上的对立。用法上常作动词,如:

例 10:尹生怼而请辞,列子又不命。(《列子·黄帝第二》)

例 11:今或言商不以自悔而反怨怼,朕甚伤之。(《汉书·王商史丹傅喜传》)

例 12:群相怨怼,无可如何。(《左文襄公奏疏·北路官军进剿大胜折》)

在现代汉语中,“怼”继承了古代汉语“怼”的语音形式和语义,也表示“怨恨”,但只能作为语素参与构词,常与“怨”构成联合式合成词“怨怼”。从意义上看,虽然古代汉语“怼”与现代汉语“怼”也能表示核心义素[+对立],但网络新词“怼”的义项更复杂且自成系统,义项之间的脉络关系较为明晰。如果仅仅是对古代汉语的继承,这种变化速度似乎有些太快了,和语言的发展规律相违背。最重要的是,如果仅是“怨恨”义的引申,语音上的变化就无法解释,现代汉语中的“怼”就是去声调,但到了网络语言中就变成了上声调,这也不合常理。因此,并不能认为网络新词“怼”来自古代汉语中的“怼”。

二、方言词与网络新词“怼”的联系

既然无法从古代汉语中追根溯源,那么网络新词“怼”又是从何而来的呢?关于这点,很多人做了相关的研究。蔺伟^[3]认为“怼”是从古代汉语“怼”的“怨恨”义发展而来,杨万成^[4]认为“怼”来自方言词“擎”,更多的人认为方言词“掙”才是“怼”的来源,持此观点的有霍壮^[5]、颜旭^[6]、杜思宇^[7]等。前文提到网络新词“怼”与古代汉语“怼”之间的区别,因此更适合将“怼”的来源锁定在方言中,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到底来自哪个方言词。这种寻根溯源需要从语音形式入手,寻找与网络新词“怼”读音相似,并且意义上有一定关联的方言词。

(一)方言词典中与“怼”有关的方言词

霍壮曾通过李荣《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8]寻找线索,指出与网络新词“怼”在语音形式和词义上有相似性的词有六种,通过进一步检索,本文对此进行了补充:

- 1.《洛阳方言词典》:【掙】tuei ㄩ 向人投掷小石块儿或用拳头直打
- 2.《哈尔滨方言词典》:【掙】tuei ㄩ ①杵;捶 ②塞
- 3.《太原方言词典》:【□】tuei ㄩ (汽车)撞。
- 4.《万荣方言词典》:【□】tuei ㄩ ①运动着的物体与别的物体突然接触;②碰见,遇到
- 5.《西安方言词典》:【□】tuei ㄩ 碰撞
- 6.《忻州方言词典》:【□】tuei ㄩ (用拳)捶、打
- 7.《乌鲁木齐方言词典》:【碓】tuei ㄩ 碰撞
- 8.《厦门方言词典》:【搥】tui ㄩ ①用拳头或棒槌敲打;②比喻相互争执;③一种推拿方法

从上述分类中可以看出,在很多方言中表达“撞击”义的词大多找不到对应的字形。这些词的存在虽然可以从侧面为“怼”来自方言词的观点提供证明,但由于无法探求“怼”的来源词,暂且不谈。而在哈尔滨、洛阳、乌鲁木齐和厦门的方言中,出现了“掙”“碓”和“搥”三个词,它们的词义与网络新词“怼”具有一定的联系。后面二词是很多研究中都没有注意到的,那么“怼”的来源是否一定是方言词“掙”则需要进行分析。

(二)相似方言词的比较

通过《汉语方言大词典》,可以对这些方言词的意义作进一步的了解。

其中,“搥”与“忤”的联系最薄弱。在《汉语方言大词典》^[9]中,“搥”是“捶”的异体字,音“chui”,解释有以下几种:①<动>用棍棒打人或捣物(西南官话)②<投掷>晋语③<动>摘花(闽语)④<动>争;计较(闽语)⑤<名>拳头(胶辽官话)⑥<量>拳(西南官话、粤语)。并且在《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中,“搥”只在厦门方言中有类似的读音和词义。也就是说,“搥”与网络新词“忤”的联系仅有一例可以证明,这种联系十分薄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搥”与“碓”两个词从语音形式上看,前者和“忤”更接近,但如果从词义上看,它们与“忤”的联系都比较紧密。在《汉语方言大词典》里,“搥”(dui)有11个含义:①<动>捅;捶;揉。(北京官话、胶辽官话、粤语);②<动>顶撞;冲撞而入(北京官话、西南官话、吴语);③<动>硬塞;硬杵(北京官话、胶辽官话)④<动>抵消(江淮官话、西南官话)⑤<动>支撑(西南官话)⑥<动>伸(粤语)⑦<动>拉;用力拉(吴语)⑧<动>取出(吴语)⑨<动>抽搐(吴语)⑩<动>不和睦双方相遇(西南官话);此外,还有<动>当面(西南官话)。其中①②两个义项与网络新词“忤”十分相似。

“碓”(dui)的解释有以下几种:①<名>臼(西南官话)②<名>舂米的作坊(徽语)③<动>舂(西南官话、吴语)④<动>猛烈冲撞(中原官话、兰银官话)⑤<动>用拳头杵人(东北官话)⑥<动>点(头)(闽语)⑦<动>蹬;踢(吴语)⑧<动>用话语把别人话堵住(东北官话)。其中④⑤⑧三个义项与网络新词“忤”十分相似。

单从意义上看,“搥”和“碓”都可以作为“忤”的来源,但是,如果从使用范围和义项的常用性上看,“搥”广泛的使用基础和较高的使用频率为其成为“忤”的来源词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搥”的①②两个义项在北京官话、胶辽官话、西南官话和吴语、粤语中都可以找到相关用例,并且在《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中可以看到,这些义项也是“搥”的常用义。但是“碓”与“忤”相关的义项只在东北官话、中原官话和兰银官话中出现,并且“碓”的常用词义往往都与“舂米”有关,如太原方言、哈尔滨方言、忻州方言中的“碓臼”,洛阳方言中的“碓杵”,万荣方言、成都方言中的“碓窝”,贵阳方言中的“碓杆”,娄底方言中的“碓嘴”,南昌方言中的“碓身”等等。

古籍中“碓”和“搥”的词义也可作为例证。《方言疏证》对碓做出解释:“碓,舂也。主发谓之机,古者龀父初作舂,碓礲也。”《中州全韵》中还提到了“碓”的声调:“碓,舂也,又去声。”基本上,古代汉语中“碓”只与“舂米”有关,并没有引申出“顶撞”义。而关于“搥”,《康熙字典》引用《集韵》中的解释:“搥,靛猥切,音胎。排也。又除耕切,音橙。撞也。”其中的“排”也可解释为“推”,“推”和“排”在《说文解字》中互为义训。因此,“搥”在古代汉语中的意义基本可以解释为“推”和“撞”,进一步证明了“搥”的常用义和“忤”联系更紧密。

因此,相比较而言,不管是语音形式,还是使用基础,不管是历时层面,还是共时角度,“搥”都比“碓”和“搥”更适合作为网络新词“忤”的假借本字。可以说,这种在日常生活中具有较大的使用群体并且使用较为频繁的方言词,才更能迅速地为广大所理解和接受。

三、“忤”的成词过程

虽然网络新词“忤”与方言词“搥”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判断“忤”的来源以及分析成词的影响因素仍需要进一步探究。总体说来,网络新词“忤”的产生受到了音律、字形和语用等方面的多重压制。

首先,“忤”的产生受到了语用需求的驱动。网络中的言语交际既具有口语的特点——用词生活化并且结构形式简单,又受到书面语的限制,必须以文字为载体。与此同时,网络将天南海北的人聚集在一起,言语交流中会不自觉地带出各自的方言词,但此时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即需要用文字来表达方言词的相关意义。虽然通过对比分析,推测出原方言词是“搥”,但由于这个词十分生僻,很少有人了解,更不可能将它与“dui”联系起来,这就推动使用者在现代汉语中选择新的字形,“忤”就是在这样的驱动下产生的。从

这样的驱动因素来看,“怼”在形成初期相当于原方言词的借形词。

而选择载体的过程并不是无序的、偶然的,是充分考虑到了对语音、字形与要表达的相关意义之间的联系,并且这些因素在“怼”成词之后又对其词义产生了影响,从而使“怼”虽然脱胎于方言词,却与原词有着较大的差别。

“怼”的产生最先受到了方言词“捋”音律的制约。方言词“捋”在大众的一般认知中可及度较低,其字形不明、用法模糊,但是它的语音形式对使用者来说是极为明晰的,属于凸显层面。因此,“怼”最先受到方言词的音律压制,继承了后者的语音形式。而这种传承是基于语言使用者心智中已有的语言知识作为认知参照点。“dui”这一音节较为特殊,现代汉语中仅有两个声调——阴平调和去声调,比起阴平调,和上声同为仄声调的去声更适合作为替代声调,这就进一步缩小了选择的范围。而“怼”在现代汉语中的语音形式为“dui”,与原方言词声母和韵母都没有变化,也符合使用者的心理预期。因此,这种语音上的制约因素是“怼”成词的基础。

除了语音的影响,“怼”的产生也受到了字形的制约。汉字作为表意文字,字形与语义有着紧密的联系,虽然在经历汉字简化后,这种联系变得渐趋微弱,但这种语言知识储存在汉民族的心智中。当语言使用者想要构建出一个字形不明的词的外在形式时,这种信息自然而然地就会得到激活。“怼”的字形结构是“上对下心”,有两相抵触的形象色彩,而方言词在词义中体现出[+对立]的语义特征,这与“怼”的形体色彩有不谋而合之处。因此可以说,“怼”的产生受到了字形的压制。这种字形压制还体现在对语义的影响上,由于“心”符的存在,使“怼”似乎更容易与情绪、态度相联系,从原方言词中继承来的语义反而处于弱势地位。比如在百度资讯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 月 19 日的 79 条新闻中,仅有 1 条是“碰撞”义,其他均是和“态度对立”与“斗嘴、调侃”有关。在原方言词中“碰撞”义与“顶撞”义在使用频率上并没有这么大的差距,但字形的制约,使词义受到字形的影响,更多地与情绪、态度上的对立相联系。这也体现了汉字作为表意文字特有的信息传递方式,前几年的网络新词“囧”和“糗”也是在字形的影响下产生的,可见字形对成词有着重要影响。

上述的影响因素是“怼”成词的语言内部因素,而使用者的知识水平则是从侧面促进了“怼”的形成。语言使用者作为语言主体,其对语言的认知程度也影响着词语的产生。总体说来,知识水平越高的语主语言知识的库藏越多,在实际语用中能提取的信息就越多,反之则越少。而在语言创新中,后者由于具有较少的固化的语音、语义知识,往往成为创新的先驱,“怼”的产生就得益于这类人群的创造。第 43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显示,截至 2018 年 12 月,网民的学历结构中受过初中教育的人群最多,占 38.7%;而受过大学专科、大学本科及以上的网民占比分别为 8.7%和 9.9%。由此可见,大多数网络语言的使用者并未受过高等教育。基于此,很多人对“怼”这个较为生僻的字都比较陌生,更不提了解其读音和意义,因此可以说“怼”的产生是以原方言词词义和读音为基础的造词。而张薇薇认为表达“态度对立”义的“怼₁”来自古代汉语,但其他义项的“怼₂”来自方言词“捋”。这种看法从语义角度出发并没有问题,但却忽略了实际语用中使用者的心理,化简为繁的造词法并不适合快节奏的网民,也不适合教育水平并不高的使用人群。并且,如果“怼”来自古代汉语,读音上没必要进行改变。因此,“怼”的来源不应该二分化,并且从“怼”产生的驱动因素来看,它是作为一个方言词的替代进入网络语言中的,不管“怼”如何变化,其发展都是从方言词“捋”出发的,应该来源于方言中。

总之,当人们在网络中进行言语交际时,想要使用方言词但没有确切的字作为参考,这就推动使用者从现代汉语已有词汇中找到相关代替。而“怼”在语音形式以及字形上与“捋”的相似性使它能够传承“捋”的信息,再加上其他因素的影响,从而形成了网络新词“怼”。

四、方源词的扩大化

虽然“怼”被称为网络新词,但从它的来源和实际的使用情况来看,更适合将其划分为方源词。刘叔新

将来自于方言并进入共同语的词定义为“方源词”，以示与方言词的区别。并且他在《词目的确定和使用的范围》一文中对“进入共同语”的标准作出进一步阐释：“书面语中的方言词能属于民族共同语，要有两个先决条件：其一，书面语所在的报刊须是权威性的，所在的著作须是当代规范的；其二，词的意义或表义方式新颖奇特。”^[10]对于“怼”来说，第二个条件完全符合，需要商榷的就是是否符合第一个条件。虽然“怼”主要的使用范围是在网络领域中，但从“怼”目前的发展状态来看，它已经逐渐被共同语所吸收。最好的例证就是“怼”已经出现在“人民日报海外版”的新闻标题中，如“美俄会结束‘互怼’吗？”（2017年7月6日）；“美国与伊核五国怼上了”（2018年5月24日）也就是说，“怼”符合“进入共同语”的标准，可以将之视为“方源词”。

但是刘叔新在对方源词进行描述时还提到进入共同语中的方源词和存在于方言中对应的词彼此意义一致，语音形式也相当接近。很明显，“怼”与原方言词相比意义产生了变化，并不一致。而这种情况体现的是方源词的扩大化，即来自方言的词以网络为媒介进行传播，在频繁地使用中引申出了新的意义，并有了加入共同语的趋势。这种发展既体现在词汇意义上，也体现在色彩意义和语法意义上。

（一）词汇意义的变化

词汇意义的变化可以分为一个词的意义的发展变化和词的一个意义的发展变化。一方面，方源词意义的发展变化具体表现为义项的增多、减少和相关的消长变化。由于“怼”在不同的方言中意义均有区别，因此在进入网络语言后往往表现为义项的减少，但这更有利于方言词的稳定发展。由于地域的不同，同一个方言词会具有不同的意义，这些义项之间有的有联系，有的无联系，缺乏联系的义项往往会造成记忆和使用的负担。在语言的经济原则体现得最为明显的网络语言中，孤立的义项更容易被淘汰，与此同时非常用义项和常用义项之间地位也可能会发生转变。在“搥”与“怼”的转变中，类似于“伸手”“拉”和“取出”这些意义与人们常用的“态度对立”和“撞击”义没有太大联系，因此这些义项就被淘汰了，而留下来的义项之间联系则体现得更为紧密，更成系统。

另一方面，“怼”的词义变化也体现在一个义项上，具体表现为一个义项意义的扩大，即中心义素不变，限定义素减少。^[11]方源词“怼”在成词前有“顶撞”义，其内在的语义特征包括[+当面][+对上级或长辈][+不满][+反对][+说话]，但是在成词后，只有[+说话]这个核心义素始终保留。比如前文中的例5中的“怼”的语义特征是[+说话][+当面]和[+不满]，例4中的“怼”语义特征为[+说话]和[+不满]，除了核心义素外，其他限定义素都或多或少发生了变化。

和一般的方源词不同，这些扩大化的方源词往往是以网络为传播媒介的。因此，这些方源词必然会受到网络语言的影响。最常见的变化就是词汇意义有了差异，如“给力”在闽南话中是“激力”的意思，意指“使劲”，而进入网络语言后，“给力”开始表示“带劲儿”，最终新的引申义进入了共同语。这种变化得益于网络语言的快速传播，在一般语言领域中较长时间才能完成的词义引申，这些方源词通过网络领域中的频繁使用在短时间内就完成了。

（二）色彩意义的变化

除了词汇意义的发展变化，“怼”的色彩义进入网络语言后也产生了差别变化。词的色彩意义通常是指词在表示某一理性或概念意义的同时所表现出来的某种倾向或情调意义。^[12]对于色彩意义的分类，人们有不同的看法。这里采取齐治平的看法，分为七类，于此仅就“地方色彩”和“感情色彩”展开论述。

首先，方源词必然走出了方言区域，并在共同语中使用，因此，方源词的地方色彩是最容易消退的。正如本文提到的“怼”，除了原方言区的人，很少有人能意识到它与方言的联系。并且随着“怼”意义的变化，它与原方言词之间的相似度也逐渐减低，其地方色彩更容易消退。和一般的方源词相比，以网络为媒介产生的方源词地方色彩消退速度更快。这一方面得益于网络语言的快速传播，使得这些词在产生后能够被迅速地高频使用，从而更快地退去地方色彩；另一方面是由于网络上新词的数量十分庞大，地方色彩的陌生感在夜以继日的新词冲击下很容易被消磨殆尽。因此，很多方言词在进入网络语言后，一般人不会想到甚来自方言。

其次,感情色彩的变化也是以网络为媒介产生的方源词的特点。词义感情色彩的变化可以分成两种情况,一种是词义原有义项的感情色彩的变化,另一种即某些词增加的义项带有褒或贬的感情色彩。^[13]“怼”主要体现的是后一种情况,“怼”增加了“调侃和斗嘴”这个义项,这个义项带有中性甚至褒义的感情色彩,代表的是言语双方之间关系的亲密,和原先的“顶撞”义体现的贬义色彩有所不同。当然,感情色彩的变化不是每个方源词都会产生的,只是当方源词的词汇意义发生变化时,感情色彩也更容易有所不同。于根元提到“网络语言以幽默、风趣”见长,^[14]这就使得网络新词在感情色彩上更容易体现出非贬义色彩,而受到网络语言影响的方源词也是如此。

(三) 语法意义的变化

方源词“怼”语法意义的变化一方面与韵律句法有关,另一方面也受到网络语言的影响。原方言词“擰”作为及物动词,除了与宾语相结合外一般只带补语,基本不见前置状语的修饰,如:“他擰得我一句话也说不出”。但是“怼”的用法就较为灵活,作动词时,不仅可以加宾语,还可以在前面加状语,如“怒怼”“笑怼”“互怼”等等;同时也保留了加补语的用法,如“怼回去”“怼死”。相较而言,第一种最为常见,而这与汉语韵律有关。“怼”是一个单音节词,而汉语中最小的音步是双音节音步,单音节是蜕化音步,不构成韵律词。这就使“怼”要与其他句法成分结合,在句子中以双音节的形式出现。并且考虑到“强信息居后法则”。^[15]简而言之,双音构式是最具原型效应的现代汉语音节构式,“怒怼”“笑怼”比“怼”的可接受性和良构性更高,并且“单音节状语+怼”的形式能突出动词,因此这种形式最为常见。

同时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更倾向于用“怼”来替代其同义词。从音节的数量上看,单音节的“怼”更易与单音节形容词、副词相结合,形成“怒怼”这样的标准音步,这也是汉语中最常见的韵律形式。但“怼”的同义词大多都是双音节词,如“冲撞”“调侃”等,它们本身就是标准音步,若要加以修饰限定,一般都会用双音节词作状语,如“互相调侃”,但这和“笑怼”相比显得有些冗长,与语言经济原则相违背。若用单音节词作状语修饰则不符合汉语的韵律习惯,汉语中不存在“笑调侃”“怒反驳”这样的偏正短语。因此,用“怼”替代其同义词能更简洁、有效地传递语言信息,这不仅得益于“怼”词义的丰富,也受到单音节形式的影响。

除了语音上的影响,网络语言中的书面语特点也对“怼”语法意义的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怒怼”“笑怼”等用法口语色彩十分薄弱,更适合用于书面语中,而方言词则极具口语化,与之不兼容,因此无法加单音节状语。而网络语言虽然依旧具有口语的种种特点,但其表达形式却是以文字为载体,因此“怼”的书面色彩得到加强,从而产生了上述的用法,也加速了“怼”加入共同语的进程。

总体说来,以网络为媒介产生的方源词并不多,因为很多方言词在进入网络语言后只流行了一阵就迅速消失,无法进入共同语。但是这种方源词一旦产生,在词汇意义、色彩意义和语法意义上就与一般的方源词产生差异,前者比后者更加活跃,语言的动态性体现得更明显。这些变化以网络语言的特性为基础,网络语言具有幽默风趣、以文字为载体的特点,与此同时又能在短时间内迅速传播,比一般的语言领域更能使方源词实现扩大化。

五、余 论

从方言词“擰”到方源词“怼”,中间经历了复杂的变化过程。其成词不仅仅是以方言词为基础,更受到了字形、语音和使用者知识水平的制约。并且同一般的方源词相比,以网络为媒介产生的方源词在成词后因为网络语言的特性发生了扩大化,从词汇意义到色彩意义再到语法意义,其变化无一没有受到网络语言的影响。当然,虽然这些以网络为媒介产生的方源词进入了共同语,但这并不代表它们能一直存活其中。若要对这些方源词的发展进行预测,不能仅仅依靠方言,还需考虑到网络语言中这些词的使用现状,毕竟这些词以网络为媒介,网络也是它们使用的主要领域。若是没有了广泛的使用基础,即使进入了共同语,这些方源词依旧会消退。

参考文献:

- [1] 田菊. “怼”字漫谈[J]. 现代语文, 2017(12).
- [2] 张薇薇. 浅析“怼”的来源[J]. 三江高教, 2017(4).
- [3] 蔺伟. 说“怼”[J]. 语文建设, 2017(3).
- [4] 杨万成. 说“怼”[J]. 汉字文化, 2017(2).
- [5] 霍壮. 网络热词“怼”实为“揶”[J]. 现代语文, 2017(7).
- [6] 颜旭. 从“怼”字说开去[J]. 汉字文化, 2017(2).
- [7] 杜思宇. “怼”: 旧语新说[J]. 湖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2).
- [8] 李荣. 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6.
- [9] 许宝华, 宫田一郎. 汉语方言大词典[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9.
- [10] 谭汝为, 孟昭泉. 论汉语的“方言词”和“方源词”[J]. 中州大学学报(综合版), 1998(1).
- [11] 刁晏斌. 对当代汉语词汇状况及其研究的思考[J].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 2011(3).
- [12] 刁晏斌. 现代汉语史[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6.
- [13] 吴晓雪. 改革开放以来汉语词义褒贬色彩变化研究[D]. 哈尔滨: 黑龙江大学, 2004.
- [14] 于根元. 网络语言概说[M].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1.
- [15] 冯胜利. 汉语韵律句法学[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0.

On the Expansion of the Mandarin Word from Dialects Taking Neologisms “duǐ” as an Example

QIAN Tianyan, YIN Qun

(School of Liberal Arts,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Jiangsu210008, China)

Abstract: It seems that there is no word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he source of the neologisms “duǐ” in ancient Chinese and modern Chinese. However, the meaning and phonetic form of the dialect word “duǐ” are very similar to the neologisms “duǐ” and it has a wide range of use. Therefore, it can be inferred that the neologisms “duǐ” comes from the dialect word “duǐ”, and it can also be regarded as a mandarin word from dialects on account of its tendency to join in common language. Compared with general words from dialects, the meaning of “duǐ” has changed a lot. What’s more, its lexical meaning and grammatical meaning are more abundant, and the meaning has also changed. It reflects the expansion of the mandarin word from dialects which uses the medium of the Internet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meaning.

Key words: “duǐ”(怼); “duǐ”(揶); mandarin words from dialects

[责任编辑 铁晓娜]